

当代美国文学

1945—1972

(上)

〔美〕伊哈布·哈桑著

陆凡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济南

目 录

一、序论.....	(1)
二、小说.....	(27)
引论.....	(27)
主要小说家.....	(33)
重要小说家.....	(46)
小说的类型和倾向.....	(80)
短篇小说.....	(80)
战争小说.....	(81)
南方小说.....	(84)
犹太小说.....	(89)
黑人小说.....	(93)
异化和无政府状态.....	(98)
从讽刺作品到荒谬小说.....	(103)
科学小说.....	(108)

附:

作家、作品中英文对照表.....	(113)
------------------	---------

一 序 论

美国文学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崛起于世界文坛。一个包括了T·S·埃利奥特、埃兹拉·庞德、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沃利斯·斯蒂文斯、格特鲁德·斯坦、舍伍德·安德森、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和龙金·奥尼尔的时代，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的。这些作家的创造力重新照亮了过去；因此，前辈的大师们，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到亨利·詹姆斯，更深刻地出现于人们心目中。某些美国式想象的主题又重新开始获得更加丰富的光彩：天真与阅历、伊甸园与乌托邦、自我与社会、自然与历史。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型式统治着诗歌和戏剧；模拟的传奇故事和自传盛行于小说作品中。无论是用激烈的语言或者是用感伤的调子，无不敏锐到了极端，或者是和历史（时间）作斗争，更多的是和边疆（空间）竞赛，美国文学发展了自己的一整套神话，以这个神话为背景，每一个作家都感到必须确定自己的身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名的这些美国作家的地位，无论就整体或就个人来说，都是很清楚的。这些作家一开始就脱离

了三十年代的文学和政治传统,也就是说,脱离了自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意识形态在艺术形式中的表现要求简化的地方太多了,而极权主义的威胁,不管左的或是右的,都使人对于现实的正统看法产生怀疑。战争消耗了他们很多的精力,但也形成了他们的毫不含糊的明朗态度、对于生存的洞察力和对于未来事物的预见。不管他们在战后还存在着什么幻想,以上这些,对于他们继续生存下去,似乎都是必要的;他们在文学上发明的任何躲避的或进攻的技巧,都同样有助于生存下去的这一目的。

如何生存下去,看来确实是当代人心头的秘密和重大的困惑。特别是在美国,那里的变革以使人发晕的速度变动着;人向着一个充满决定性问题的命运冲进得比以前更快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和毁灭世界的炸弹有关的。从奥什维茨到广岛大毁灭的记忆、从朝鲜到越南一连串战争、多次地下爆炸、对自然环境的蹂躏、对美国贫困的新认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各种各样的政治抗议——所有这一切使一种危机感持续下来,这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完全忽视的。科学能够夺取月球,或是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但是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够做出最后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判断。一些人认为技术是崇高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在恶性地猖獗,但是许多人都同意,比较旧的价值崩溃使世界陷入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形式——秩序和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恶魔式的混合物之中。当管理手段和通讯手段互换了它们的职能,当计算机使得社会生活的形式简单化了也复杂化了的时候,人类的私生活就受到巨大的

侵犯。而公众活动的领域似乎越来越甚地，被各种各样的，瞬间的、滑稽的、可怕的幻想控制着。就个人来说，暴力、无政府主义、“精神沉沦”，对群体社会和超级大国的超现实主义状态都提不出真正改变的办法。这种经验和外国是共同的，这就加深了美国和欧洲文学之间的联系，也加深了那些看到世界既广泛地调和又紧张地分裂这样怪事的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好象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全球村”的预言，（这个预言说，交通发达使世界残酷地被包围起来，又讲到世界上各族人民急剧地退居到民族、宗派和部落生活中去）突然实现了。

然而，尽管战后时期的文化奇怪地既激烈又讲求享乐，既忿怒又冷淡，美国作家依旧能在其中为他的想象力赢得一席之地。假如他不能逃避免于对他的国家产生的茫然之感（这等于是对“美国生活方式”信任的危机）的话，他也不能否认震动着他的巨大的活力。这种能力的一部分支持着他去创造、去实验和反抗；他感觉得出在文学中新语言和新价值开始出现。他的国家总在继续地追寻它自己简短的过去，正如它在现在就塑造世界的未来。这样，他就被迫岌岌可危地生活在预言和怀旧这两者的汇合点上。假如美国之梦经常被梦魇所代替，那么梦魇还要让位给黎明前夜深时刻的另外一些梦的。

如果把战后时期说得好象它有一种统一的特点，那么是错误的。每十年都证明在个人情调上有和公共政策相似的转

变。这可能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总统的更换中看得最明显了。当罗斯福在1945年死去的时候，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还没有发生；人类距离原子时代还有一小段路程。杜鲁门做了这个重大的决定，使战争结束了；马歇尔计划开始把破坏了的国家连合，并且复兴起来。那不仅是由理直气壮的胜利感所引起的，也不仅仅是由于美国上升到明显的出群超众的地位所引起的，四十年代后期的热情，表现出对世纪中期生活前景的一些期望。但是杜鲁门主义不久证实了冷战的现实；强权政治招致来谨慎和对内部的控制。紧跟着的是在五十年代，即艾森豪威尔年代里，一阵又一阵地受到反共歇斯底里和垮掉分子不合作的破坏的，富裕加顺从的统治。杜勒斯国务卿的“大规模报复”的观点甚嚣尘上。而在同时，被《时代》和《生活》杂志编辑部称之为“沉默的一代”的人们，却找到了他们的城市近郊和远郊的乐园。但是，在1960年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后，国家重新获得了它自己的年轻的意识；它发展了一种适合于它的口号“新边疆”的风格。但是1963年肯尼迪的被刺似乎在国内激发了一种新的暴力或者疯狂，杀害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也是在那十年之内下手的。同时约翰逊政府没有创造出“伟大的社会”来；美国更深深地陷入了越南战争，引起了它自己的争吵和分裂。1964年的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先导了各种叛乱的力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和“气象预报员”、“学生全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种族平等协会”和黑豹党；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子同性恋爱解放战线”；“美国墨西哥人”和“红色权力”。在六十年

代，嘻皮士和伊皮士，“颓废派”和“疯狂派”的反文化兴旺起来；从阿什伯利高地传播到斯太腾岛，对于用幻觉剂和鬼神的兴趣达到了高峰；后来发生的生态学运动到处传播着。虽然确定七十年代的情况还嫌太早，反对刚刚过去的，在尼克松政府之下的，疯狂的行动主义的某种反应是可以肯定的。肯特州和杰克逊州的屠杀学生以及对入侵柬埔寨的大规模抗议都发生在1970年，似乎标志着美国的心理生活的某种转折点。尼克松总统使美元贬值、到北京和莫斯科去旅行，未来还处于未知中。

但是围绕着美国作家的思想气候是远远地比政治口号和政治事件所能表示的更为浓厚，更为变化多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哲学和神学，科学和技术中的倾向也显示了几十年来变化着的特点，暴露出当代人思想领域的实际情况和幻想。这些倾向丰富了文学的想象力，甚至当这些倾向向想象力提出挑战的时候，它们也还是丰富了它；并且它们所提出的反映现实的方法，使公众有时发现比传统的诗歌、小说或戏剧更能夺人心目。因而，就有了“非小说”^①——有时被称为“高级新闻”——的流行和它的日益增长的威信，甚至波及到热爱文学的大学生之中。因而有助于把生活经历中隐含的模式定形化的某些学院式的教条和意识形态也就有了必要。

在五十年代里，关于文化的种种观点特别泛滥，这样，例

^①非小说：不按一般小说作法写的，特别在情节发展和小说结构方面打破常规的小说。

如，戴维·里斯曼在他的两部有影响的作品，《孤独的人群》（1950）和《个人主义重新估价》（1954）中就考察被他称为“另外的方向”的一种新的社会倾向。这种倾向使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新教的伦理发生了微妙的修正，一种对于“内心方向”和由此而生的一切价值的修正。里斯曼对行为的分析是敏锐的，但他并不判断它。他的道德上的中立主义，在艾尔弗雷德·金西的两本简略的，引起争论的作品，《美国男性的性行为》（1948）和《美国女性的性行为》（1953）中，有同样的看法。以统计数字和个人访问为基础，这些研究提出了关于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哲学问题，否认性“正常化”的观念，因此向这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理想挑战。另一方面，C·赖特·米尔则向美国的民主思想挑战。在他的两本书，《白领职业者》和《权力中坚》（1956）里，激烈地揭露了工业发展到后期的，国家的隐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尽管它们在主题和方法上有所不同，所有这些作品和其他的作品，如威廉·H·怀特的《组织人》（1956）、万斯·帕卡德的《看不见的说客》（1957）、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富足的社会》（1958）都同样指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出现。这种有时只好称之为“群体社会”的新的体制，在一些巨大的研究作品，如马克斯·勒纳的《美国作为一种文明》（1957）在一些文集，如伯纳德·罗森堡和戴维·曼宁·怀特的《群众文化》（1957），或是埃里克·拉拉比和罗尔夫·迈耶索恩的《群众的休闲时刻》（1958）中也有论证。

一般的对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兴趣在这十年里也达到一个

高峰。虽然许多人类学家在战前已经作出重大贡献，他们的某些最好的著作——如象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群岛上人的成熟期》（1928）和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类型》（1934）只是在战后简装书工业发展以后才得到普及。文学上对于神话、宗教仪式和原型的感受在五十年代由于阐明古典形式对现代技巧的作用的评论家们的促使，变得更敏锐了。文人们回到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8）和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1922）等经典作品上或者回到较近一些的C·G·容格的《心理学和炼金术》（1953）和奥托·兰克的《英雄诞生的神话》（1953）等翻译作品上去，恢复使用艾略特、乔伊斯和曼在前一个时代那样丰富地开创使用的那些自然的和心理的基本形象，那些人对于他的宇宙的原始关系。在这样的前景下象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1949）和菲利普·惠尔赖特的《燃烧着的喷泉》（1954）等作品，引起了神话批评家的特殊兴趣。

精神分析学单独地提出一种美国城市生活的新的谈话方式，创造了它自己的一种行话和知识分子的正统观念。但是，正象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弗洛伊德和我们文化的危机》（1955）中卓越地指出的，精神分析学也包括艺术的和生存的哲学原理。后者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中也隐晦地提到了。特别是在文学中，人物和行动、梦寐和现实、象征和暗喻、机智和幽默等观念，从本能的理论方面获得新的活力，而人和他自己或和其它人的无穷的冲突产生了新的文化的意义。终于，美国的心理分析运动扩

大到包括哈里·斯塔克和卡伦·霍内的社会心理学以及埃里克森·埃里克森的有独到之见的思想，他的作品，从《童年与社会》（1950）到《本性：青年和危机》（1968）受到广泛的重视。B·F·斯金纳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最远，发展了他自己的实验心理学的分支，他追随巴甫洛夫和沃森，把它称之为“行为主义”。在斯金纳看来，行为主义所企求的至少是一种能预言或控制一切行动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完整的科学和技术。虽然他的思想早在乌托邦小说《第二个华尔腾》（1947）中就出现了，他的预言，有一些人认为是可怕的，另一些人认为是有益的，其全部影响，只是在《在自由和尊严之外》（1971）中才成为明显的。

回顾一下，五十年代假如不是商业广告式的顺从的十年的话，似乎也象是文化破裂的十年。但是这十年并不是无例外地被一种共同秘诀所控制，也不是仅仅被社会学的幻想所统治。意志坚强而有力量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1953）和《自我和历史的戏剧》

（1955）等著作中要求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卡尔·巴思和保罗·蒂利希的正规的神学再创造了新教的基本问题，并且在俗人之间复活了宗教布道。这样，例如蒂利希的《生存的勇气》（1952）一书成为宗教存在主义的著名的事例。同样，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尼古拉斯·伯迪阿耶夫、马丁·布伯、和卡尔·雅斯柏斯的名字为人们广泛所知。他们的包罗各种民族和信仰的丰富思想，投合了美国人寻找自我确定或是自我超越的新方法。确实，五十年代的宗教意志所包含的要

多于自我超越；它有时要求摒弃西方意识。这一点被垮掉运动和东方神秘主义及禅宗佛教的复活加以戏剧化了，这方面，神学博士、苏祖基和艾伦·瓦茨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把美国说成是富裕的、一致的，那种陈词滥调的反对，也能够从世俗的存在主义汲取力量，利用人的强烈的自我感。在美国的经验中，总归有很多东西是符合存在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是赤裸的、人是依靠自我的、人蔑视死亡等观点的。这样，萨特尔的思想，特别是卡缪的思想，在五十年代就在我们的国土上生根了。实际上，嘻泼斯特^①的生活方式，还出现在这些思想之前：嘻泼斯特由于密切接近了危险、本能和他的灵魂向他发出的反叛命令，以他全部的存在去反抗世界末日的空虚。这样一个美国黑夜的英雄的形象来自梅勒的著名的文章《白色黑人》，这篇文章见于《我自己的广告》（1959），他似乎标志着时代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假如五十代表现为内向暴发的话，那么以后的十年就该被称为外向暴发。前几年社会学的、宗教的和存在主义的兴趣延续到六十年代，虽然时代的气质变得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带有试验的性质。一切都受到怀疑，新的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发展起来。

这种情绪中的某些东西在保罗·古德曼的无数作品中，

^①嘻泼斯特：美国存在主义者的一种称号。该名称出现在嘻皮士出现之前，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为爵士乐或时髦风尚之爱好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指一部分对美国现实不满，接受欧洲存在主义思想的人。

从与珀西瓦·古德曼合作的《社团》，到杰出的作品《在荒谬中长大》（1960）、《象一个被征服的省份》（1967），得到反映。虽然古德曼的散文有时可能枯燥无味，他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思想家，通晓许多学理。他把他的乌托邦倾向掺杂上实用主义，自称为“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并且试图调合“老左派”和“新左派”。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救济事业”、性的自由、民族虚伪性、过激的政治和特别是教育方面的观点在六十年代的青年文化中是很流行的。但是，最后，其他人的作品，例如肯尼思·肯尼思顿的《年轻的激进派》（1968）、西奥多·罗斯扎克的《反文化的形成过程》（1966）和查尔斯·A·赖克的《美国的青春化》（1970）等，可能对于青年运动增加了一种更温暖的感觉。

六十年代中，诺曼·O·布朗、赫伯特·马尔库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R·巴克明斯特·富勒的思想影响也开始广泛地使人感觉到了。布朗在《生命对死亡》（1956）中，开始对于语言、历史、和弗洛伊德的自我，进行彻底的，精神分析的批判，实际上这是对于那种“被称做人的病态”的批判。他的计划是通过一种“狂欢的意识”，来恢复生命的本能。在《爱的本体》（1966），一篇用激动人心的诗歌的强烈感情的格言的形式写成的著作中，布朗就走得更远了。他号召取消受抑制的文化和理性，取消现实原则本身。他的象征性的幻想包括了一切事物的已经丧失了的统一性。虽然那种创造性的幻想的特点很难传达出来，它的力量触及到新的——一种人体的意识——例如说与伊萨莱恩学院有联系的那一种

——，并且看来是为神秘主义、多种形式的反常现象、神秘的色情主义提出了根据。在这方面，布朗和在威廉·赖克的著作中已见端倪的弗洛伊德修正派的说法是一致的。另一个体系，在海德格尔、萨特尔、雅斯柏斯和宾斯旺格的著作中已有所预示的存在主义的心理分析，导致了亚伯拉罕·马斯洛和罗洛·梅的美国著作。他们的《爱情和意志》（1969）相当受人欢迎。

赫伯特·马尔库斯在《爱神和文明》（1955）中的心理学和布朗早期所关心的问题有些地方是一样的，但马尔库斯的“剩余抑制”观点，和实际上他的全部非宗教的思想方式，来源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比来自布朗的相信神秘主义和炼金术的传统要更多。马尔库斯主要是做为一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预言家，作为一个当代否定“战争——福利国家”的杰里迈亚^①而在全世界的激进运动出了名的。在《单因子的人》（1964）、《纯粹容忍批判》（1967）和《论解放》（1969）中，他求助于历史的理性和创造性的反叛，这种“否定性”的超验力量去和对存在的“抑制性的容忍”和“绝对统治”进行斗争。在马尔库斯的思想和新左派的论述，象迈克尔·哈林顿的《走向民主左派》（1968）、汤姆·海登的《造反与抑制》（1969），以及用有着更多滑稽气味的，弗里（即阿比·霍夫曼）的《调皮捣蛋的革命》（1968）和杰里·鲁宾的《做罢》（1970）等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

^①杰里迈亚：圣经中一希伯来预言家。

但是对当代思想的主要挑战，来自科学和技术，它们不可逆转地一定要改变人、社会、和自然。科学本身突破性的发展经常不被公众注意，直到一颗炸弹把一个环岛用原子轰炸了，或是一个人迈了巨大的一步跨上了月球；但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些突破性发展的意义是紧迫的。一些书籍传达了这种紧迫性、奇迹和危机的感觉，从诺伯特·威纳的《人类的用途》（1950）开始，包括象戈登·拉特雷·泰勒的《生物学的定时炸弹》（1968）、雷内·杜伯斯的《如此人性的一个动物》（1968）和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震动》（1970）。

在新技术的预言家们中间，马歇尔·麦克卢汉从事研究各种宣传工具对于文化的冲击。他的作品，特别是，《格登堡群才》（1962）、《懂事的宣传工具》（1964）、《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1968）和《文化是我们的事情》（1970）中，散布着对于当代生活的，杰出的，古怪的见解，麦克卢汉说，我们愿意从后视镜里观察当代生活。他说，宣传工具是人的引伸，而每一种工具都有它自己的传信息的办法，他把前一代的文化（机械的、线性的、印刷为主的、视觉的）和现在的文化（电气的、非线性的、以电视为主的、听觉——触觉的）加以对比。他总结说：“用电气缩小了的地球只不过是一个村庄”。按照他自己的“非线性逻辑”，他在后来的作品中采用解说词、美术拼贴、漫画、引语、玩笑和受芬尼根斯·韦克启发而用的双关语形成的一种表现方式。

R·巴克明斯特·富勒在把他的“综合性的、预见性的

设计科学”运用于人类生活状况时，走得更远。他是测量圆屋顶和合金材料的房屋的建筑师，也是一个数学家，制图家，发明家，宇宙进化论者和银河系时代的诗人，坚决主张人要在这个“宇宙飞船的地球上”和谐地生存，没有贫困和战争。他的作品，包括《自动化教育》（1962）、《通向月亮的九条链子》（1963）、《乌托邦或者湮没》（1969）和《宇宙飞船地球操作手册》（1970），发展了一种经常出现的善良愿望的模式。这些愿望把人的智力看作是宇宙间“反热寂”的创造力；把经常可以用较少的力量做较多事情的“缩短过程”看做是知识和技能的增进；把“综合力学”看做是一些从它的局部观察不到的整个体系的作用，而把一个在电子计算机上玩弄的“世界游戏”看做是人类的虚荣和凶杀政治的代替。富勒的乌托邦或幻想的巨大的感染力建立在他的“宇宙不是一个失败”这样一个信念上，不过他在关于人的堕落这一问题上看法就未免太天真了。

当然，在六十年代还有许多其他的逆流，在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比作为任何理智教育中的学术定义更为重要。“黑色权力”运动把《马尔科姆X自传》（1965）和弗朗茨·范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8）作为它的中心的论述。妇女解放运动利用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神秘主义者》（1963）、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学》（1970）和杰曼·格里尔的《女性的宦官》（1970）。生态学运动，追溯到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而在保罗·埃里克的《人口炸弹》（1968）和巴里·康芒纳的《封闭圈》（1972）中发

现更多的可怕的预示。“上帝的死亡”派的神学家们求教于托马斯·J·J·奥尔蒂泽和威廉·汉密尔顿的《激进的神学和上帝的死亡》(1966)。蒂莫西·利里的《狂欢政治学》

(1968) 提供了一个正在衰退中的服用幻觉剂的人们的暧昧的宣言。新色情主义，写同性恋的或是写色情的，利用格罗夫出版社自1960年至1962年捍卫它出版D·H劳伦斯的《查特利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的权利以后审查制度的放宽，获得便利条件。同时，从威廉·H·马斯特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所著《人的性反应》(1966)中的科学实验记录中得来的关于性行为的奥妙的知识，被广泛地使用。“交朋友”小组^①、格式塔心理疗法和情感训练也成为时髦的事了，而从康拉德·洛伦茨的动物研究和罗伯特·阿德里的非洲人类学的通俗化发展而来的人种学，对于人的侵略性格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莱昂内尔·泰格和罗宾·福克斯的《至尊的动物》(1971)中得到例证。最后，在象卡尔·R·罗杰斯的《学习自由》(1969)和乔治·B·伦纳德的《教育和狂欢》(1968)等作品中，教育又回到了进步教育和以学生为中心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三十年代最早由约翰·杜威提出的。以上这些倾向中哪一个在七十年代可能增长或是减少力量，现在只有占卜家才能知道。

在所有的战后时期的脑力创作活动的类型中，有一种逐

^① “交朋友”小组：现代美国的一种所谓精神治疗方法，受疗者在组内与其他成员“交流内心感情”。

——译者

渐地被证明是比许多其他各种更适合文学的气质。这种类型脱离了传统的训练，恢复了旧有的散文的自由形式。诚然，新的新闻体的文章经常综合了散文和诗、传记和分析、逸事和政论。这样，它试图承认文化的压力、自我的压力和想象力的紧张性。因而，它也允许作者和读者为他们的“人物”在世界的复杂性之间创造一个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级新闻学”的有些最使人重视的例证出自黑人经验之中。由此，就有贯穿于詹姆斯·鲍德温的《一个土生子的笔记》

（1955）、《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和《下一次的火》（1963）《马尔科姆X的自传》（1965），和埃尔德里奇·克利佛的《冰上灵魂》（1968）等作品中的感情充沛的有力的句子。以更温和得多的调子，汤姆·沃尔夫的《糖果色的橘片样的流线型的娃娃》（1965）、《水站匪邦》（1968）和《电冷却器酸性测验》（1968）等作品把美国的生活风习和道德的种种方面加以戏剧化了。

但是对于这种新散文的最有独创性的实干家可能是约翰·凯奇和诺曼·梅勒。凯奇，一个在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方面先锋运动的热情的鼓吹者，也在《沉默》（1961）和《从星期一起一年之后》（1967）中，把他的特殊的注意力转向社会和人类问题。他主要根据易经试做排字和计算机化的随意操作，因而能够吸收苏祖基、杜尚、布朗、富勒和麦克卢汉的观点，依靠无数其他来源和他自己的札记，形成一个既有实际又有幻想的的不连贯的叙述，以禅宗的精神来承认技术。